

溫故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年，河南發生大災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盤黃豆芽和兩隻豬蹄，把我打發回了一九四二年。當然，這頓壯行的飯，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頓美味佳餚；同時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見得多麼可觀。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遜·福爾曼去河南考察災情，在母親煮食自己嬰兒的地方，我故鄉的省政府官員，宴請兩位外國友人的菜單是：蓮子羹、胡椒辣子雞、栗子燉牛肉、豆腐、魚、炸春捲、熱饅頭、米飯、兩道湯，外加三個撒滿了白糖的餡餅。這飯就是放到今天，我們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書中和大飯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說，這是他所吃過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說：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說，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鄉的省政府官員，決不會像白修德這麼扭扭捏捏。說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鄉發生了吃的問題。但吃的問題應該僅限在我們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那時，我估計在我們這個東方文明古國，無論發生什麼情況，縣以上的官員，都不會發生這種問題。不但不存在吃的問題，性的問題也不會匱乏。

還有一個問題，當我順著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時，我發現五十年後我朋友把他交給我的任務的重要性，人為地誇大了。吃完豆芽和豬蹄，他是用一種上校的口氣，來說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景象令人觸目驚心。全省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後，又遇蝗災。災民五百萬，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多。「水旱蝗湯」，襲擊全省一百一十個縣。

災民吃草根樹皮，餓殍遍野。婦女售價累跌至過去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餓死三百萬人之多。

死了三百萬。他嚴肅地看著我。我心裏也有些發毛。但當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時，我不禁啞然失笑。三百萬人是不錯，但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無非是小事一樁。在死三百萬的同時，歷史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宋美齡訪美、甘地絕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戰、丘吉爾感冒。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樁，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環境中，都比三百萬要重要。五十年之後，我們知道當年有丘吉爾、甘地、儀態萬方的宋美齡、斯大林格勒大血戰，有誰知道我的故鄉還因為旱災死過三百萬人呢？當時中國的國內形勢，國民黨、共產黨、日軍、美國人、英國人、東南亞戰場、國內正面戰場、陝甘寧邊區，政治環境錯綜複雜，如一盆雜拌粥相互攪和，擺在國家最高元首蔣介石委員長的桌前。別說是委員長，換任何一個人，處在那樣的位置，三百萬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慮的問題。三百萬是三百萬人自己的事。所以，朋友交給我的任務是小節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當時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宮、唐寧街十號、克里姆林宮、希特勒的地下掩體指揮部、日本東京，中國最重要的

部分是重慶黃山官邸。這些富麗堂皇地方中的衣著乾淨、可以喝咖啡洗熱水澡的少數人，將注定要決定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命運。但這些世界的軸心我將遠離，我要蓬頭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餓殍的河南災區。這不能說明別的，只能說明我從一九四二年起，就註定是這些慌亂下賤的災民的後裔。最後一個問題是，朋友在為我壯行時，花錢買了兩隻豬蹄，匆忙之中，他竟忘記拔下盤中豬蹄的蹄甲；我吃了帶蹄甲的豬蹄，就匆匆上路；可見雙方是多麼大意。

二

我姥娘將五十年前餓死人的大旱災，已經忘得一乾二淨。
我說：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餓死許多人！」

姥娘：

「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歲，與這個世紀同命運。這位普通的中國鄉村婦女，一九四九年以前是地主的僱工，一九四九年後是人民公社社員。在她身上，已經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國歷史。沒有千千萬萬普通的骯髒的中國百姓，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反革命歷史都是白扯。他們是最終的災難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歷史歷來與他們無緣，歷史只漫步在富麗堂皇的大廳。所以俺姥娘忘記歷史一點沒有慚愧的臉色。不過這次旱災餓死的是我們身邊的父老鄉親，是

自己人，姑娘的忘記還是稍稍有些不對。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這牽涉到另一場中國災難——一九六〇年。老人家性情溫和，雖不識字，卻深明大義。我總覺得中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仍給人以信心，是因為有這些性情溫和、深明大義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懷叵測，並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著一位鄉村醫生，現在姑娘身體很好，記憶力健全，我母親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時候的一舉一動，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記憶裏。我相信她對一九四二年的忘卻，並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觸目驚心，而是在老人家的歷史上，死人的事確是發生得太頻繁了。指責九十二年間許許多多的執政者毫無用處，但在哪位先生的執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經常、到處被活活餓死，這位先生確應比我姑娘更感到慚愧。這個理應慚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孫，絕沒有發生飢餓。當我們被這樣的人統治著時，我們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後怕嗎？但姑娘平淡無奇的語調，也使我的激動和憤怒平淡起來，露出自嘲的微笑。歷史從來是大而化之的。歷史總是被篩選和被遺忘的。誰是執掌篩選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後我提起了蝗蟲。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後，發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蟲。這一特定的標誌，勾起了姑娘並沒忘卻的蝗蟲與死人的聯繫。她馬上說：

「這我知道了。原來是飛螞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螞蚱把地裏的莊稼都吃光了。牛進寶他姑姑，在大油坊設香壇，我還到那裏燒過香！」

我說：

「螞蚱前頭，是不是大旱？」

她點著頭：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還出不了螞蚱。」

我問：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個幾十口吧。」

這就對了。一個村幾十口，全省算起來，也就三百萬了。

我問：

「沒死的呢？」

姥娘：

「還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現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經不在了。二姥娘死時我依稀記得，一個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時我已二十多歲，記得是一顆蒼白的頭，眼瞎了，像狗一樣蜷縮在灶房的草鋪上。她的兒子我該叫花爪舅舅的，在村裏當過二十四年支書，從一九四八年當到一九七二年，竟沒有置下一座像樣的房子，被村裏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問：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沒有逃荒。東家對我好，我又去給東家種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厲害嗎？」

姥娘比著：

「怎麼不厲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澆一瓢水，『滋滋』冒煙。」

這就是了。核對過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當過支書，大事清楚，我一問到一九四二年，他馬上說：

「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麼？」

他吸著我的「阿詩瑪」煙說：

「一入春就沒下過雨，麥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塊顆粒無收；秧苗下種後，成活不多，活的也長尺把高，結不成籽。」

我：

「餓死人了嗎？」

他點頭：

「餓死幾十口。」

我：

「不是麥收還有三成嗎？怎麼就讓餓死了？」

他瞪著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軍糧了？不交稅賦了？賣了田地不夠納糧，不餓死也得讓縣衙門打死！」

我明白了。我問：

「你當時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歲吧。」

我：

「當時你幹什麼去了？」

他：

「怕餓死，隨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儉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儉舅舅家在我們當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戶人家。我姥爺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長工。東家與長工，過從甚密；范克儉舅舅幾個月時，便認我姥娘為乾娘。俺姥娘說，一到吃飯時候，范克儉他娘就把范克儉交給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褲腰裏。一九四九年以後，主子長工的身份為之一變。俺姥娘家成了貧農，范克儉舅舅的爹在鎮反中讓槍斃了；范克儉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銀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說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沒享，就跟著受了幾十年罪，圖個啥呢？因為她與范克儉舅舅結婚於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幾十年中，我家與范家仍過從甚密。范克儉舅舅見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親眼見俺姥娘拿一塊月餅，像過去的東家對她一樣，大度地將月餅賞給叫「娘」的范克儉舅舅。范克儉舅舅臉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與范克儉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樹下，（這棵槐樹，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憶一九四二年。一開始范克儉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這時我想起他是前朝貴族，不該提一九四九年以後實行的公元制，便說是民國三十一年。誰知不提民國三十一年還好些，一提民國三十一年范克儉舅舅暴跳

如雷：

「別提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壞得很。」

我吃驚：

「三十一年為什麼壞？」

范克儉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燒了一座小樓！」

我不明白：

「為什麼三十一年燒小樓？」

范克儉舅舅：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嗎？」

我答：

「是呀，是大旱！」

范克儉舅舅：

「大旱後起螞蚱！」

我：

「是起了螞蚱！」

范克儉舅舅：

「餓死許多人！」

我：

「是餓死許多人！」

范克儉舅舅將手中的「阿詩瑪」煙扔了一丈多遠：

「餓死許多人，剩下沒餓死的窮小子就滋了事。挑頭的是毋得安，拿著幾把大鋤刀、紅纓槍，佔了俺家一座小樓，殺豬宰羊，說

要起兵，一時來俺家吃白飯的有上千人！」

我為窮人辯護：

「他們也是餓得沒辦法！」

范克儉舅舅：

「餓得沒辦法，也不能搶明火呀！」

我點頭：

「搶明火也不對。後來呢？」

范克儉舅舅詭秘地一笑：

「後來，後來小樓起了大火，麻稈浸著油。毋得安一幫子都活活燒死了，其他就作鳥獸散！」

「唔。」

是這樣。大旱。大饑。餓死人。盜賊蜂起。

與范克儉舅舅分手，我又與縣政協委員、一九四九年之前的縣書記坐在一起。這是一個高大的、衰敗的、患有不住擺頭症的老頭。雖然是縣政協委員，但衣服破舊，上衣前襟上到處是飯點和一片一片的油漬。雖是四合院，但房子破舊，瓦簷上長滿了枯黃的雜草。還沒問一九四二年，他就對他目前的境況發了一通牢騷。不過我並不覺得這牢騷多麼有理，因為他的鼎盛時期，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當縣書記的時候。不過那時的縣書記，不能等同於現在的縣委書記，現在的縣委書記是全縣上百萬人的父母官，那時的縣書記只是縣長的一個筆錄，何況那時全縣僅二十多萬人。不過當我問起一九四二年，他馬上不發牢騷了，立即回到了年輕力壯的鼎盛時期，眼裏發出光彩，頭竟然也不搖了。說：

「那時方圓幾個縣，我是最年輕的書記，僅僅十八歲！」

我點頭。說：

「韓老，據說一九四二年大旱很厲害？」

他堅持不搖頭說：

「是的，當時有一場常香玉的賑災義演，就是我主持的。」

我點頭。對他佩服。因為在一九九一年，中國南方發水災，我從電視上見過賑災義演。我總覺得把那麼多魚龍混雜的演藝人集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沒想到當年的賑災義演，竟是他主持的。接著老人家開始敘述當時的義演盛況及他的種種臨時抱佛腳的解決辦法，邊說邊發出爽朗開心的笑聲。等他說完，笑完，我問：

「當時旱象如何？」

他：

「旱當然旱，不早能義演？」

我繞過義演，問：

「聽說餓死不少人，咱縣有多少人？」

他開始搖頭，左右頻繁而有節奏地搖擺，擺了半天說：

「總有個幾萬人吧。」

看來他也記不清了。幾萬人對於當時的筆錄書記，似也沒有深刻的記憶。我告別他及義演，不禁長出一口氣，也像他一樣搖起頭來。

這是在我故鄉河南延津縣所進行的旱情採訪。據河南省誌載，延津也是當時旱災最嚴重的縣份之一。但我這些採訪都是零碎的，不完全、不準確的，五十年後，肯定夾雜了許多當事人的記憶錯亂

和本能的按個人興趣的添枝或減葉。這不必認真。需要認真的，是當時《大公報》重慶版派駐河南的戰地記者張高峰的一篇報道。這篇報道採訪於當年，發表於當年，起碼比我同鄉的記憶更真實可靠一些。這篇報道的標題是：《豫災實錄》。裏邊不但描寫了旱災與飢餓，還寫到飢餓的人們在災難裏吃的是什麼。這使我深深體會到，翻閱陳舊的報紙比到民間採訪陳舊的年頭便當多了。我既能遠離災難，又能吃飽穿暖居高臨下地對災難中的鄉親給予同情。

這篇報道寫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

△記者首先告訴讀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著那可憐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了的人們形容豫災的淒楚字眼。

△河南今年（指舊曆，乃是一九四二年）大旱，已用不著我再說。「救濟豫災」這偉大的同情，不但中國報紙，就是同盟國家的報紙也印上了大字標題。我曾為這四個字「欣慰」，三千萬同胞也引頸翹望，絕望了的眼睛又發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時間久了，他們那餓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一百十縣（連淪陷縣份在內），遭災的就是這個數目，不過災區有輕重而已，茲以河流來別：臨黃河與伏牛山地帶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

△河南是地瘠民貧的省份，抗戰以來三面臨敵，人民加倍

艱苦，偏在這抗戰進入最艱難階段，又遭天災。今春（指舊曆）三四月間，豫西遭雹災，遭霜災，豫南豫中有風災，豫東有的地方遭蝗災。入夏以來，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災。豫西一帶秋收之蕎麥尚有希望，將收之際竟一場大霜，麥粒未能灌漿，全體凍死。八九月臨河各縣黃水溢堤，汪洋泛濫，大旱之後復遭水淹，災情更重，河南就這樣變成人間地獄了。

△現在樹葉吃光了，村口的杵白，每天有人在那裏搗花生皮與榆樹皮（只有榆樹皮能吃），然後蒸著吃。在葉縣，一位小朋友對我說：「先生，這傢伙刺嗓子！」

△每天我們吃飯的時候，總有十幾二十幾個災民在門口鵠候號叫求乞。那些菜綠的臉色，無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沒有那些剩飯給他們。

△今天小四飢死了，明天又聽說友來吃野草中毒不起，後天又看見小寶死在寨外。可憐那些還活潑亂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陸續地離開了人間。

△最近我更發現災民每人的臉都浮腫起來，鼻孔與眼角發黑。起初我以為是因餓而得的病症。後來才知是因為吃了一種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腫起來。這種草沒有一點水分，磨出來是綠色，我曾嘗試過，一股土腥味，據說豬吃了都要四肢麻痺，人怎能吃下去！災民明知是毒物，他們還說：「先生，就這還沒有呢！我們的牙臉手腳都是吃得麻痛！」現在葉縣一帶災民真的沒有「霉花」吃，他們正在吃一種乾柴，一種無法

用杵白搗碎的乾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腫臉不麻手腳。一位老夫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殺光了，豬盡是骨頭，雞的眼睛都餓得睜不開。

△一斤麥子可以換二斤豬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復了原始的物物交換時代。賣子女無人要，自己的年輕老婆或十五六歲的女兒，都馱到驢上到豫東馱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販人的市場賣為娼妓。賣一口人，買不回四斗糧食。麥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饅八元一斤，鹽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沒有救災辦法，糧價不會跌落的，災民根本也沒有吃糧食的念頭。老弱婦孺終日等死，年輕力壯者不得不鋌而走險，這樣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災了，而需要清鄉防匪，維持地方的治安。

△嚴冬到了，雪花飄落，災民無柴無米無衣無食，凍餒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徵著他們的命運。救災刻不容緩了。

重慶黃山官邸。這裏生機盎然，空氣清新，一到春天就是滿山的桃紅和火焰般的山茶花。自南京陷落以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這裏是蔣介石委員長的住處。當時蔣在重慶有四處官邸，這是其中之一。領袖的官邸，與國家淪陷、國家強弱沒有關係；這裏既不比